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先秦两汉

巴蜀书社

译注 李国祥 等

审阅 安平秋

史记选译

〔上〕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史记选译

上

本书责编：梅锦辉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盛寄萍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第一批50种)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巴蜀印刷厂
1990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套

ISBN7-80523-357-8/Z·27
定价： (50种) 130.00元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夏阳东北有座龙门山，极富形胜之丽，所以司马迁自称是生于龙门。

司马迁的生卒年代已不可确考。根据有关记载作大致的推算，他可能是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卒年当在汉武帝末年。司马迁幼年时期在家乡耕牧劳作，十岁时便开始诵读用《古文》写的书籍。在这以后，他还向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古文经学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从而掌握了比较坚实的古代文献知识。

根据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里的说法，他的祖先多居官任职，特别是充任史官的多。司马迁的父

亲司马谈，于汉武帝的建元、元封年间被任命为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责是，不治理民政，而专门掌管国家图书档案及天文历算，是直接为天子及朝廷奔走效命的。司马谈尽力职事，他曾向星象专家唐都学习天文知识，向涪川人杨何学习《易》，向黄生学习有关黄老学派的理论；他熟悉国家收藏到的书籍，又广泛搜求文献资料，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对先秦学术流派及各派的思想特征，他以自己的体察和心得，写出了《论六家要旨》，作了精要的评述，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太史令确实具有非同凡响的才能和见识；他编次史料旧文，准备撰写一部史书，虽由于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病逝，未能竟成，但他在临终前将这一宏大志向未能完成的遗恨，向司马迁倾吐了，并嘱咐司马迁绍继史职之后，不可忘记完成撰著史书的大业。

司马迁从小受他父亲的教诲，做学问踏实勤敏，特别重视考信史料和从事实地调查考察。二十岁时，他离开长安，南游江淮等地，先后到过屈原自沉的汨罗江畔、传说中舜南巡病逝后安葬之地九疑山，渡过浙江登会稽山探“禹穴”，考察了春申君黄歇的宫殿遗址，访问了韩信的故乡淮阴，瞻仰了曲阜孔子的故里，登上邹县的峯山察看秦始皇东巡到达过的地方，滞留于古地鄆（今滕县）、薛（今

薛城)、彭城(今徐州),过丰、沛,路过战国时的魏都大梁(今开封),然后返回长安。这次出游访问,是司马迁卓有成效的举动。他接触到了传说中的舜南巡、禹治水,乃至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有关的历史与地理,调查了许多历史人物的故里及史迹。开拓了眼界,体察了风俗民情,大大地增长了历史知识,为撰写《史记》作了充分的准备。

司马迁第一次出游之后,被任命为郎中,从而有机会跟随汉武帝巡游和封禅祭祀,因而又到过崆峒山等地。后来奉命出使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足涉巴蜀之南。这样,司马迁的足迹遍及了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

司马迁是在元封三年继承太史令职务的。他整理石室金匱的图书(国家的藏书),遵照司马谈的遗训编著史书,并且参加了改订历法的工作,完成了太初历的订立。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西汉名将李陵在与匈奴激战后兵败而投降匈奴,司马迁在朝廷上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治罪,第二年被处以腐刑。天汉五年,司马迁出狱,做了中书令。他忍受了遭受腐刑的耻辱,发愤继续著述史书,前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史记》的写作。

《史记》原来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

记》，后来才简称为《史记》。它记事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时，是一部贯通三千年的通史，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全书共有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纪”十二篇，以各代帝王为中心，记述每一朝代的兴衰和重要政治事件；“表”十篇，有“世表”、“年表”、“月表”，以表格的形式，标明错综复杂的史实；“书”八篇，叙述和记载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制度的源流和变化；“世家”三十篇，记述诸侯事迹及其世系；“列传”七十篇，大多数是人物传记，有单传，也有二人的合传，还有以类相从的类传，记载了贵族、将相、官吏、策士、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经学家、隐士、刺客、游侠、滑稽、卜者、医生、商人等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有一部分列传记载了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及周边邻国的历史。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其中一部分内容是司马迁对先祖世系的概述及自己简历的陈说；另一部分内容则是缕述了《史记》一百三十篇的次第及各篇的提要。

《史记》中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是司马迁借鉴历史上已有的书籍体例加以发展推拓的。我们从《史记》的行文中可以得知司马迁读过《禹本纪》、《谍记》、《春秋历谱谍》、《世家言》等等，那

么，“本纪”、“世家”、“表”等，就是沿用了以往本有的名目。至于“书”、“传”，更是古代著述中所习见的名称。司马迁参照古代著述的各种体例，加以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对后世史学编纂有重大影响的纪传史体例。这充分表明了司马迁在整理文献时，既善于继承传统，更富于发展、创造的精神。

司马迁撰著《史记》一书，十分注意内容的充实，文献史料的真确。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蒐集遗文古事，还把实地考察所得的见闻，熔铸到《史记》里面去，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司马迁写《史记》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天道与人事，他虽然受了“天人感应”说的影响，但他却能摒弃一些荒诞不经之说，讥讽了迷信鬼神的可笑行为。他以通变的观点看待历史事件，如对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是“世变异，成功大”。他擅长排比史料，用通俗流畅、生动活泼的文字表述事件的过程，描写人物行为及形象，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字里行间灌注了个人的感慨与体验，全书浑然一体，确实成为了“一家之言”。司马迁是文献撰作的巨擘。他对

《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做到了博观约取，缜密剪裁，汇辑为翔实的古史新篇。他那简洁精练的文笔，确实是“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直而事核，表现了高超的写作技巧。从《史记》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司马迁作为一个杰出史学家的秉赋。汉初以来，文章述作的质朴沉着、覃思深虑及行文的明快敏捷之风，熏陶了司马迁，造就了司马迁，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一代述作的典范。我们可以这样说，《史记》既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完美的文学著作。诚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里所赞誉的，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亘二千年来，它对我国的史学和文学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多么的悠长啊！

司马迁死后，《史记》一书在汉宣帝时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惲公布于世。根据《汉书·司马迁传》中的记载，东汉时已缺少十篇，有录而无书。后世传布的一百三十篇《史记》，其中有的为后人的续作，如书中标明褚先生补的文篇等，有的则是后人臆杂而成的，但全书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司马迁的原作。《史记》问世后，作为一部开创性的史著杰构，一直受到学者们的称誉和重视，有的为之作“音义”，有的从事研究、训释文句，取得显著成

就的代有其人。先是徐广作《史记音义》，继之南朝宋裴骃在《史记音义》的基础上，推拓范围，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到了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三十卷，既考辨音义，又阐述研究的见解，张守节撰《史记正义》三十卷，把对《史记》的训释又推进了一步。自唐朝以后，研究《史记》蔚然成风。清代学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对《史记》所载的史事作了系统的考证，极富参考价值。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著的《史记会注考证》及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汇集了旧注及前人考证的成果，是从事《史记》研究不可缺的参考书。

《史记》的版本较多，其中南宋黄善夫的家塾刻本享有善本的美誉，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记》，即系据这善本影印的。此外明嘉靖、万历时南北监《二十一史》刻本、毛氏汲古阁的《十七史》刻本，乾隆时武英殿的《二十四史》刻本，都属于较好的刻本，流传广，影响也大。

《史记》一书，在世界文化宝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著名篇章，已有多种外语文本，日本学者从事《史记》研究的更是大有人在。1956年，司马迁已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得到了崇高的历史

地位。

司马迁是封建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史记》书中，他也宣传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和唯心主义的偏见，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们今天不可苛求于司马迁的。但是，我们在阅读《史记》时，却要有批判地加以鉴别，摒弃其封建性的糟粕，光大其民主性的精华。

《史记》流传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它的名篇早已脍炙人口，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史记》全书，也已由中华书局于1959年重新整理出版，新版本是以张文虎精校的金陵书局刻本为底本进行校点的，最为完备，便于读者阅读。我们这次编译的这本《史记选译》，其原文即录自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篇目则依照王伯祥的《史记选》，有一些篇在译注时作了部分删节。注释和译文除参考了传统的旧注成说外，对于现代专家学者们的整理研究成果，也多有汲取。古今学者研究《史记》的精辟见解，对我们虽大有启迪，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能尽取诸家所长融会于译注文字中，可能在注译中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敬祈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注者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

目 录

前 言	1
项羽本纪	1
陈涉世家	72
留侯世家	94
陈丞相世家	132
孙子吴起列传	162
商君列传	183
平原君虞卿列传	207

魏公子列传	235
范雎蔡泽列传	257
廉颇蔺相如列传	317
田单列传	338
刺客列传	349
淮阴侯列传	393
季布栾布列传	443
张释之冯唐列传	458
魏其武安侯列传	477
李将军列传	509
汲郑列传	539
游侠列传	559
滑稽列传	578